

**【印】加内什·特里切 (Ganesh TRICHUR)**

## 个人简况

圣劳伦斯大学政治经济学助理教授，从事全球政治经济学，亚洲政治经济学，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工作。

## 联系方式：

地址：圣劳伦斯大学，行政区，纽约州 1361

## 近期成果

“作为现代社会系统中社会性自我保护的伊斯兰政治和印度政治”，in Khaldoun Samman and Mazhar Al-Zo'by eds 。(2008) *Islam and the Orientalist World-System*, Palgrave, NY

“私有化的前景：福利私有化的概念、教训和私有化灾难”，in Hillary Potter ed 。(2007) 《和风暴赛跑：卡特里娜风暴的 *Racing the Storm: Racial Implications and Lessons from Hurricane Katrina*, Lexington Books, Maryland.

“新帝国主义危机和 21 世纪政治经济全球化的特点”，《全球化》(Routledge) May 2005

“帝国及其大众” (co-authored with Steven Sherman), 《世界系统研究》，Winter 2004

## 全球金融危机与东亚的崛起

【印】加内什·特里切

大范围的突发性彻底转变成为了当今全球危机的标志。自 07 年 8 月以来，报纸的头条就夸大其词地谈论这些变化，将这些变化与华尔街主要投资银行的倒闭以及之后通过美国联邦储蓄和财政部门的帮助而渡过难关，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次优级抵押贷款危机联系起来。这些对世界经济来讲是一次完全的改变。原因在于如果新世纪的开始如 Gillian Tett 所言，“未来的经济将走向财政市场，没有规律可言，自由市场为主导，未来的经济部门是一些新型的衍生部门，且这场经济游戏被冠以杠杆原理的名称”，那么很清楚的是“以上所讲的这些概念都是过时的。”另外，如果当前的金融危机以信贷时常的贷款危机开始的，那么它的影响将扩展至所有的金融资产，范围从证券到公司债券再到政府债券，从而使得外汇交易市场更加变幻无常。(FT Guide to Davos: 27 January 2009)。这些金融动荡以及北半球一些破产的金融机构不知耻地向国家寻求帮助的现象似乎证实了 Karl Polanyi (1944) 敏锐的洞察力，即“自由资本主义”从来都没有从国家制度这一“有形的手”中摆脱出来。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崛起以及中国通过出口型发展策略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已经成为了美国副总统乔·拜登以及美国财政部长 Tim Geithner 操控所谓的外汇利率的攻击目标。作为回击，中国总理温家宝拒绝了这些“荒谬”的控诉，并强烈地辩驳，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是处于一个“合理的且平衡的水平”，而美国的高消费水平和低储蓄量使美国走向了“不可持续发展模式”(FT Monday 2 February 2009)。此外，温家宝还回绝了中国搞经济保护主义的说，因为美国仍旧是中国出口的最大市场，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国财政和证券的最大持有者（虽然许多的持有在当今被称为“有毒证券”）。

当前的经济结构呈现出了二个方面的紧张局势，一方面是美国（以及北半球）的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便是中国与美国（以及欧洲市场）经济的互相依赖。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过后，中国带领的东亚经济（基于沿海的大生产力的出口型工场）的扩张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物质扩张的先锋，而美国在过去的三十年仍旧是凯恩斯主义的最后一块消费领土以及东亚（和南亚）巨大生产力工场的主要需求国。然而，当前的金融危机的矛头却指向负债累累的且作为东亚生产者的一个持久需求来源的美国经济所带来的局限。此外，金融危机还显示出东亚经济的扩张（目前是满足北半球市场的需求），在不久的将来可能逐渐停顿下来。

当“几乎所有在两年前似乎固若金汤的机构，以及那些大众信任的机构，都受到了市场的攻击”时，这些紧张的局势仅增强了对未来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尽管北部投资银行渡过了难关，但是“美国经济仍旧缺乏大量的可借贷资本”(FT Guide to Davos 2009: 7-8)。全球所有经济领军阶层所遵守的经济信号表明了一次世界经济衰退的开始。在 2009 年一月召开的大连世界经济论坛上，世界各地的经济政治精英们对

全球经济畅所欲言，之前的“全球化共识”似乎已经全部消失，认为国际经济一体化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途径这一想法也消失了。(Gideon Rachman: Financial Times Wednesday 28 January)。最新达成的共识是：随着经济危机影响范围的扩大，世界各国相对于采取巨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在美国以及欧盟国家，虽然更多的是在美国），也许更倾向于采取保护主义，发放补助金和国债（在北半球实施以上措施，从而增加未来几代人的债务负担）。与此同时，尽管全球的精英们对他们通过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来统领世界政治经济的能力不再存有信心，他们对中国“脱钩”和从富裕的北半球国家中“兴起的市场”这些可能性仍旧持怀疑态度。自2008年十一月和十二月以来，中国的出口显然有所下降，成千上万的小型企业被迫关闭，一千多万的劳动者失业，中国GDP增长率能在2009年保持在6%以上的可能性很小(Geoff Dyer: Financial Times Wed 28 January:6)。尽管中国计划在未来两年投资四万亿人民币（五千八百五十亿美元），但这样做存在产能过剩的危险。印度正面临着经济衰退，南半球的一些其它国家也如此。尽管中国正通过城市化和提高科技来保持增长势头，但是问题是中国（更大范围上讲是南半球经济）依赖出口贸易和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来保持之前的高增长率能持续多久？

在当前的经济危机中，最严重的困境也许可以陈述如下。一方面，很显然，美国经济发展模式随着当前的经济危机已经走入了死胡同，正如温家宝总理（在Financial Times）所说的：这种模式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国外，都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另一方面，中国带领的东亚经济的扩张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似乎与美国（更大范围上而言是北半球经济）消费者需求合计的财富紧密联系起来。这种困境是如何创造出来的？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当前的僵局一遍对它进行改革呢？

下面的章节是我对自己论点（即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和中国带领的东亚经济扩张的当前阶段是紧密相联系的现象，因此需要一同阐述）的大纲。

## 一、新自由主义的金融扩张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

首先，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是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的新自由主义“金融扩张”(Braudel 1982; Arrighi 1994)的结果。这次金融扩张的中心便是金融猜测的重新复活——追随马克思资本积累的“节略版公式”(M-M': M' > M)——通过货币主义的意识胜利达到（工业和金融上）大范围的制度撤销。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是美国统治阶级对重蹈历史覆辙的资本过度积累的回应。新自由主义将自己标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利润危机，这种利润来自于不断地向由美国带领的政府和企业联合推进的1945年之后的全球发展道路上进行投资。这种冷战发展道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达到了局限，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在东南亚的战败。随后因调整的美元对黄金汇率的瓦解而发生了美国赤字和世界经济危机，相伴而来的是在战后参加为美国大权组织和立法的布雷顿森林机构的瓦解。这两种由过度积累危机带来的瓦解是统治阶级的利润危机，也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之后的一种立法危机。在这个过程中，20世纪70年代目睹了统治阶级对凯恩斯-福特主义共识（当时

是北半球经济和东亚经济以及南半球其它地区经济的理论支撑)的瓦解。兴起于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共识 (其货币主义者的实验室便是 1973 年政变后的智利; 美国财政危机后的纽约市) 对于重拾北半球经济统治阶级的权威是成功的尝试。在 1965 至 1973 年之间, 美国的私企部门利润率下降了 30%, 7 国集团的利润率下降了 20% (Brenner 2002: 22)。阶级权利的衡量是通过对美国收入处于顶端的 1% 的居民的控制体现出来, 这种阶级权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陷入了低谷。(Harvey 2005: 44; 15-22) 。 In the U.S. neoliberal doctrines helped restore class power to its upper class strata through the 1979 Volcker (monetarist) Shock and the emergence of a new political class represented by the election of Reagan and the Christian Moral Majority 。 In the U.K. the Right came to power in the form of Thatcherism 。在美国, 新自由主义教条已通过 1979 沃克尔休克法以里根以及 Christian Moral Majority 的当选为代表的新政权的兴起, 帮助将其阶级权利恢复到更高阶层。在英国, 右翼以撒切尔主义的形势掌权。这些发展促使资本主义核心的统治阶级开始从资本(M-C-M': M'>M)的"扩大再生产"(1945 年后的福特-凯恩斯主义)到对伴随资本积累(M-M': M'>M)循环的财政扩张上的投资(Arrighi 1994: 1-15)。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 跨国资本的高度可变性, 尤其是"热资金"的短期流入和流出新自由主义国家, 成为了新自由主义注意财政扩张的标志 — 这种扩张是通过货币主义的统治, 国家在工业和财政上的大规模撤销政策 (尽管美国, 欧盟以及日本通过发放农业补助和减税的方式继续保护着农业) 以及国有资产的大规模私有化实现的。

然而, 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伴随着两种对国家间制度相矛盾的影响。一方面, 新自由主义通过撤退所有 (凯恩斯主义) 福利国和发展国, 导致了国际间制度里各国政权的丧失。新自由主义是通过福利国和发展国的解体来实现的。在 1979 年"沃克尔休克法"有效地提高了第三世界借款 (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第三世界国家从投资银行借款, 当时世界经济充斥着流动资金, 利率很低) 的利率之后, 紧接着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发生了借贷危机, 这些都加剧了第三世界发展国家的解体和破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南半球提出了"结构调整计划"。在非洲, 这一计划迫使非洲国家终止了那种会导致整个非洲经济解体的发展道路(Ferguson 2006)。1989 年之后的俄罗斯 (以及东欧), 其私有化通过西方的"休克疗法"带来了无休止的社会动乱(Gowan 1999), 这一动乱直到普金成功掌握中央政权, 带领俄罗斯走向一条与新自由主义所描述的截然不同的道路才终止。在印度, 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为公社暴乱和印度宗教政权的复活创造了增长的空间。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计划 (在非洲, 俄罗斯, 印度和南美洲), 带来的不是发展, 而是严重的结构倒退。

另一方面, 不是所有处于国际制度里的国家都被新自由主义的转变导致了政权的丧失。这是因为在新自由主义阶段, 世界经济的发展主要发生在那些与新自由主义统治关系不大的国家和地区。在新自由主义的几十年, 经济的发展主要发生在东亚。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所带来的其中一个结果 — 这一期间, 许多不同的经济机构相继处于领头羊的地位, 最近而言, 东亚经济的扩张是在中国的带领下 — 便是东亚一些国家仍旧是强国, 不断加深资本的积累过程, 且在大多数情况

下使得大量外汇储备成为可能（日本，台湾，韩国，中国）。此外，东亚各国采取的发展策略似乎是效仿日本模式。因为是日本首次采用了出口型经济发展策略（尤其是在1950年越南战争之后），以美国市场作为自己的最终目标。这种发展策略相继被台湾和韩国效仿，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和之后，中国，台湾，东南亚和印度都有效仿。

## 二、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由东亚领头的物质扩张是如何受东亚经济危机影响的？

我总结的第二个论点便是20世纪80年代的金融危机，尤其是97，98年的东亚金融风暴，已经瓦解了（新自由主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全球化的共识。这一论点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论证。

（一）在1979年“沃尔克休克法”之后，20世纪末爆发的几次金融危机中—包括瓦解第三世界凝聚力的债务危机—97/98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显然破坏性最强，这次金融危机扰乱了各地区的社会秩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介入将金融危机复杂化，使得危机对东亚和东南亚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

（二）然而，相对金融危机而言，地区经济的复苏过程更引人注目。尽管20世纪90年代对日本经济发展而言是“迷茫的十年”，日本商业网尤其是作为先锋部门的电子产业正在积极地通过减少与其它日本公司的系列企业集团联系，以及增加对中小型企业灵活性的依赖而进行结构重组(Ernst 2004: 10-12)。如此一来，日本经济似乎正朝着在大中华圈里的海外中国商业所采用的一般商业形式方向聚合。经历了97年金融危机的日本经济的未来已经与东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尤其是中国的发展越来越紧密地，错综复杂地联系起来。中国内陆（非美国）成为了当前世界范围内日本最大的出口目的地(Nakamoto 2008:4)。中国和日本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了更广泛的技术合作—自2002年以来三洋和海尔的合作关系便是例证—这种合作不仅正在不断增加，而且似乎成为了未来的趋势(Ernst 2004: 25-6)。

（三）总体而言，危机增强了区域内部的依赖性。不包含日本在内的东亚内部的国际直接投资从1999年的占总国际直接投资的37%增加到2001年的40%：“不包含日本的东亚从区域经济中获得了一半以上的内部国际直接投资” (Hamilton-Hart 2006: 115)。这一金融危机似乎也增强了东亚国家对资本流动产生更大影响的信心，以及对创造一些有更大能力来管理区域危机的强健机构的信心。以下事件显然都是很重要的：1999年创建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包含中国，韩国以及日本；2000年5月签订的《清迈协议》，为紧急的外汇流动提供支持；扩大的东盟通货交易套作；以及几个双边贸易（在2000年至2003年期间，协商至300亿美元）；以及“双边贸易协议的爆发” (Pempel 2005: 15)。这些都是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广泛不信任基础上创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在金融危机之后，只恶化了危机对地区的影响。简而言之，东亚的整合增强了一个回避美国建立的用来控制地区发展的冷战模式的过程。结果，东北亚的“核心”集团（中国，日本和韩国）彼此间的合作以及与东南亚的合作越来越

多了。同时，东亚的物质扩张不仅加深了与西亚产油国的贸易，商业和投资联系，而且也扩大了中国和非洲，中国与拉丁美洲，以及东亚和南亚区域市场之间的投资关系。

(四) 1997-8 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第三个显著的事实便是区域的财富积累。在外汇储备持有上，到 2006 年 8 月，日本在美国的财政债券达到了 6640 亿美元，而中国的持有是 3390 亿美元，超过了英国，德国和加拿大所持外汇债券的总和，即 3000 亿美元(Norris 2006)。大量当前帐户的过剩以及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积累（一万多亿，欧洲货币联盟持有 1710 亿美元，美国持有 290 亿美元），已成为这一地区强有力的金融缓冲区。

(五) 1997-8 年的金融危机部分是因为东亚生产关系的全球网络以及南半球在出口生产上的越来越强的竞争力，除此之外，Giovanni Arrighi (2007: 382)还发现 1997-8 年的金融危机也标志着北半球支付赤字的经常账目平衡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支付过剩的经常账目平衡有着越来越大的分歧。尽管世界上其它地区大多数的盈余都继续流向美国财政市场，但是越来越多的盈余正转而流向南半球，以此来简历货币储备，从而松懈北半球财政机构对南半球货币的持有。正如《金融时报》所言，中国工商银行在市场资本化上已经成为最大的“世界银”了(Anderlini 2008: 15)。基于此，我们也许可以将世界经济中“主权财富基金”的兴起作为东亚，欧亚大陆和东亚持有的外汇储备的另外一个“水池”。中国巨大的国有投资基金代表了可以用作全球投资的资本的最大集合 — 2007-8 年由美国引发的次优级抵押贷款危机便是很好的例证，这次危机导致了全球不同的投资银行的倒闭，其中一些银行中，中国还持有一些重要的股份。

### 三、我们对东亚带领在（以及之后）新自由主义时期的物质扩张的理解有哪些影响？剩余世界的未来是什么？

我最后的一个论点便是：尽管东亚地区经济有复苏能力，尽管东亚地区内部的依赖性加强了，尽管东亚地区崛起的中产阶级越来越富有，但是，对于东亚地区而言，最大的困境在于 97 年危机过后持续升温的一种趋势。也许对于东亚金融危机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东亚一直在坚持积累以美元命名的外汇储备。事实上，这种趋势似乎在 1997-8 年之后加剧了(R. Taggart Murphy 2008)。这是对一个事实的反应，这个事实即是亚洲所有国家至今为止都将持有美元命名的资产作为经济债券的最大指引，然而当前的金融危机却显示出，这些持有的美元正越来越成为有毒的金融债券。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让以中国为首的东亚采用出口美国市场的经济发展策略是否还合理呢？欧盟的市场信号也表明当前在整个欧洲地区的经济衰退也许是五十年内最惨的一次衰退！简言之，北半球经济不再是东亚全球工厂的最大需求地区。

当前经济的衰退对亚洲的未来带来了什么呢？其一，它肯定会激发东亚的精英们针对该地区的未来展开一场长期的讨论。这场讨论首先必须集中在东亚地区不断增强的物质和社会的不平等 — 这种不平等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在整个东亚地区愈演愈烈。尽管中国的发展和分配比印度更高更平等 — 中国市民的年平均收入几乎

是印度市民的两倍(McMichael 2008: 285) — 中国仍旧是世界上更不平等的国家之一。这使得中国为首的东亚扩张依赖于北半球经济对吸收不断增长的东亚劳动密集型出口的资源和能力。“这种自愿和能力不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考虑到美国不断增长的债务和欧盟几乎停滞的经济”(Arrighi et.al, 2003: 319)。“尽管中国的笔记本掌控着世界市场的 55%，且 30%的平板电视以及 20%的微处理器都是由中国生产的，但是它仅是将各地设计和制作好的零件进行组合，或者使用抄袭的设计。剩下的 40%的制造业产品都受限於中国国内市场的大小，而中国历来劳动力报酬就很低”(McMichael 2008: 286)。

因此另外一种可行的方法就是扩大“国内市场”。我们很清楚，这种国内市场的扩展如果没有一个为再分配而投资的详细计划是不大可能实现的。这种方法将给中国的扩张带来生态学和地理学上的转变 — 从之前的沿海身份转向内陆；从之前的出口型工业化转向可以维持农民生计的农业经济。简言之，这意味着将市场重新嵌入中国（以及亚洲）社会。它表明需要尊重东亚物质扩张的社会基础，即使那意味着与英美资本主义进行实质性的“分离”，以及与全球贫穷国家和地区（他们大多数都位于南半球的贫民窟）悲惨的困境相“结合”，因为对于当前扭曲的经济增长分配而言，唯一的出路便是在中国出现持续的，大范围的社会冲突。关于这方面的文件有许多（参见 Lee 2007）。对于民工（大多数是女性），她们是中国沿海经济发展策略的中间力量，但在世界范围来讲，她们是最受剥削的工人。上百万的城市工人在 1997 年进行的国有企业重组后失业了，他们的失业对于中国想成为世界工厂而言是另一个极大的损失。这两种社会力量 — 被过度剥削的民工和失业的城市工人 — 就贫穷和社会地位下降展开了越来越激烈的反抗。这种困境也反应除了亚洲其余地方工人的困境。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调整是使得讲最贫穷的阶层加入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地区的需求变得比目前更加的可实现。不管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在新千年迎接这一挑战，或者说如何迎接挑战，也许将觉得中国的未来，以及世界的未来是否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

扩大国内市场为整个南半球如何控制全球资金的流动指出了大致方向。对过去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全球化而言，世界经济出现了社会极化的最极端形式：“最极端的殖民形式就是居民隔离和区域消费，”这种极端形式随着魔鬼化的下层阶级（他们站在世界精英的大门之外）的出现而存在 — 不论是以中国和印度的民工出现，或者以南半球不断集中的贫民窟居民的形式出现。世界精英达成的共识（Citigroup Research 所言）即是：就是他们自己这个阶级推动世界的需求 (Kapur et.al 2005)；倘若他们失败了或者破产了，那么为了群众的利益，解救他们的职责就落到了新自由主义政府的头上 — 即使世界人口大多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都成为了“贫民”。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世界制度已经跨越了看似不可逆转的门槛，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城区贫民窟居民以及越来越多的“非正式经济部门”(Davis 2006) 大多数南半球的居民居住在贫民窟或者类似贫民窟的住房里。新千年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波兰尼所谓的“居住”问题。而居住问题上最具挑战的便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和南亚。同样的问题通常需要互相协调从而找到解决办法。因此，中国和南亚其余的市民们应当站起来，

为了新千年迎接这些挑战。

### 参考文献

- [1] Anderlini, Jamil.2008.“ICBC eyes biggest profit in the world”.In *Financial Times* (Thursday 21 August).
- [2] Arrighi, Giovanni.1994.*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NY, Verso
- [3]Arrighi, Giovanni, Po-keung Hui, Ho-fung Hung and Mark Selden.2003.“Historical capitalism, East and West”.In 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eds.,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59-333
- [4]Arrighi, Giovanni.2007.*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 [5]Braudel, Fernand.1982.*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6]Brenner, Robert.2002.*The Boom and the Bubble*.NY, Verso
- [7]Davis, Mike.2006.*Planet of Slums*.NY, Verso
- [8]Ernst, Dieter.2004.“Searching for a New Role in East Asian Regionalization: Japanese Production Networks in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East-West Center Working Papers, Economic Series: No.68, March 2004: Honolulu, Hawaii, 1-43
- [9]Ferguson, James.2006.*Global Shadows: Africa in the Neoliberal World Order*.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10]Financial Times.2009.*Guide to Davos*.Tuesday 27 January 2009
- [11]Financial Times.2009.“The World in 2009”: Special Report.Wednesday 28 January
- [12]Financial Times (2009).“Message from Wen”.Monday 2 February 2009
- [13]Gowan, Peter.1999.*The Global Gamble*.NY, Verso
- [14]Hamilton-Hart, Natasha.2006.“Creating a Regional Arena: Financial Sector Reconstruction,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Making”.In Katzenstein, Peter, and Takashi Shiraishi, eds.2006.*Beyond Japan: The Dynamics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08-129
- [15]Harvey, David.2005.*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6]Kapur, Ajay, N.Macleod, and N.Singh.“Plutonomy: Buying Luxury, Explaining Global Imbalances”, Citigroup Research, 16 October 2005, 2.
- [17]Lee, Ching Kwan.2007.*Against the Law*.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rx, Karl.(1867) 1990.*Capital*.Volume 1.NY, Penguin Classics
- [18]McMichael, Phillip.2008.*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A Global*

*Perspective*.NY, Pine Forge Press

[19]Murphy, R.Taggart.2008.“Asia and the Meltdown of American Finance”.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5-21 November, 25-30

[20]Nakamoto, Michiyo.2008.“China ousts US as biggest Japanese market”.In *Financial Times* (Friday 22 August)

[21]Pempel, T.J.2005.“Introduction: Emerging Webs of Regional Connectedness”.In T.J.Pempel ed., *Remapping East Asia: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28

[22]Polanyi, Karl.(1944) 2002.*The Great Transformation*.Boston, Beacon Press